

李济深的三次革命转变

陈 伯 强

李济深是“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可敬的爱国主义者”，“同中共长期合作的老朋友”，“我们国家一位享有很高声望的领导人”^①。李济深坎坷的革命生涯，曾经历了三次重大革命转变，充分体现了他为祖国独立、统一、自由、民主和富强而斗争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他正视现实，顺应历史潮流，追求真理的奋进精神。本文试就他的三次革命转变作一概述并提出一些个人的观点，有不妥之处望同仁们指正。

一、李济深早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斗争。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他所训练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威振南北，以“铁军”称誉。但后来随着“清党”和新军阀混战，这支战功煊赫的军队终于被蒋介石肢解。1929年3月15日，李济深突然被扣押，“罪名”是伙同李宗仁、白崇禧“分头发难，谋叛党国”。他被蒋介石“永远开除党籍”，剥夺了党政军大权。7月3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曾作出决议：“李济深恢复自由”^②。但实际上他一直被软禁在南京汤山俱乐部。软禁期间，他曾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丢了将军印，问渠何所之？”^③

九一八事变后，李济深获释。他坚决支持由他的旧部改编的十九路军在上海的抗战。他受军委之托去北平命令东北义勇军南下协助抗战，但蒋介石私授该部“不要接受命令”^④，并将十九路军调福建“剿共”。李济深对这种不抵抗政策深为不满，愤然离宁，赴南方联络两广和福建的民主人士，号召并筹划抗日反蒋。蒋介石勃然大怒，于1933年10月23日召开国民党中常委会议，又一次决定将李济深“永远开除党籍”，并“交政府严行拿办”。李济深与陈铭枢等在11月20日发动了著名的“福建事变”，公开举起抗日反蒋义旗。李济深“从此开始和中国共产党合作”^⑤。这是他在曲折奋斗中发生的第一次重大的革命转变。

事实证明，李济深这次转变是具有一定稳定性的。在闽变期间，他与我党驻闽代表潘汉年就政治、军事、外交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对我党有了新的认识。闽变失败了，他没有气馁。1935年7月，他同陈铭枢等在香港建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坚持联共抗日的立场。次年秋，他派钱寿康到西北与我党联络，提出了一份《抗日救国协定草案》。我党热情接待了钱寿康。毛泽东亲笔写了致李济深的复函，倍赞李济深的提议系“谋国伟画”。信中写道：“贵我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实属绝对必要”，“双方根据协定一致努力，务达抗日救亡之目的而后已”，“中华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驱逐出中国，将于贵我双方之协定开其端矣”。我党对《协定草案》提出了若干修改意见，请钱寿康带回商量，并希望李济深努力对南京当局“督促批判，责其更新”^⑥。不久发生西安事变，李济深与我党采取了一致态度，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件。他于12月15日和18日连发两电给国民党有关各方，强调指出“强寇压境，危亡即在目前，至盼号召全国所有力量，一致对外”^⑦。在整个抗战期间，李济深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在极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了廖承志、陶行知等一大批我党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周恩来、董必武对此事曾多次称道^⑧。

二、抗战胜利后，正当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和平建国”大计时，在白崇禧的一次家宴上，有人扬言要用武力解决中共问题。李济深在席间表示：“不要说内战应不应该打，就利害来说，打起来，你们一定失败。”“初中中共才有多少？后来越打越大，现在华北有百余万人，你们如何能打”？^⑨白崇禧等很不以为然。李济深断定国民党当局已蓄意发动内战，于是决心在国民党内开展民主运动。

1946年夏天，内战乌云密布。蒋介石三次电催李济深上庐山“议事”。李济深抱着最后一次力谏的想法

上了庐山。但蒋介石根本听不进他的忠言。李济深奋笔写了一封十九页的长信给蒋介石,尖锐批评他反民主和策动内战的政策,题诗两首拂袖下山。他写道:“庐山高处最清凉,为恐消磨半热肠”;“纵使上清无限好,难忘忧患在人间”^⑩。这些诗句抒发了他忧国忧民的心怀。李济深从此与蒋介石彻底分手。

在南京,李济深与董必武等我党领导人取得了经常联系。我党坚决支持他的正义立场。1947年2月下旬,国民党当局悍然下令驱逐中共代表,并肆无忌惮地扩大内战,导致国共正式破裂。3月9日,李济深在香港发表了《对时局意见》,指出“现在中国危机加深,每一个对国家负有责任感的人,都应该勇敢的站出来说话,同样,国民党本身危机更大,每一信仰总理遗教的党员,亦应该不客气的起来,改正党内反动派的错误政策,不应消极放任听其错误到底,误党误国,弄到同归于尽”。声明提出了“政府必须放弃武力统一政策”等七项意见。李济深的《三九声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5月间,国民党中常委会议竟以李济深“有背党纪”、“诋毁蒋主席及政府”的莫须有罪名,决议予以“惩处”,并下令“全国通缉”。李济深又第三次被蒋介石“永远开除党籍”。

李济深没有屈服于压力。年底,正当反动当局强令解散中国民主同盟时,他在宋庆龄、何香凝等支持下,勇敢地创建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团结了国民党内广大爱国民主人士,严正宣布“脱离蒋介石劫持下的反动中央”,同反民主势力作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是李济深第二次重大的革命转变。他对国民党中的反动派已不再存任何幻想。对李济深的进一步转变,国民党反动派恨之入骨。他们在一份内部报告中写道:李济深“妄图联合奸匪,组织联合政府,叛迹显著,且向国外与华侨间大肆宣传,耸人听闻,实可目为李之‘人民政府’野心之再度表现”^⑪。我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则热情地欢迎李济深的转变。周恩来及时向全党发出指示,强调指出:对李济深等“改变立场,拥护我党行动纲领,公开反对美蒋”,“采取欢迎态度”^⑫。基于李济深转变带来的影响,国民党当局在对他“惩治”的同时,又派人到香港去活动,对民革成员进行利诱拉拢、分化瓦解。但在我党影响下,在全国革命洪流激励下,李济深与民革其他领导人一起作了坚决抵制,使反动派的阴谋未能得逞。

三、1948年,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革命与反革命的较量到了最后决战时刻。李济深发生了最为重要的第三次革命转变。“由于革命形势的推动和他自己的爱国主义思想,终于使他逐步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⑬。

年初,美国政府曾向冯玉祥露骨地表示:“只要你们不要共产党,我们就不要蒋介石”,“我们美国政府,愿意帮你们的大忙,用钱用军火有的是”^⑭。冯玉祥写信告知了李济深。他们没有上当受骗。5月1日,毛泽东特派潘汉年送交一封亲笔信给李济深和沈钧儒,提议由三党联合发表声明号召举行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⑮。5月5日,由李济深领衔十一位民主人士联合发出向全国的通电和致毛泽东复电,表示热烈响应我党的五一号召。这是李济深第三次转变跨出的至为重要的一步。

为了配合和推动人民解放战争,加速新政协的召开,李济深积极开展了对吴化文、程潜、陈明仁、傅作义等国民党将领的劝说工作,鼓励和帮助他们举行起义。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时,李济深在致毛泽东、朱德贺电中热烈写道:“贵党领导有方,奋斗不懈,造福国家,实至伟大”^⑯。这是他首次明确承认中共领导地位和作用的表示。

此时,南京政府正在作拼命挣扎,企图“划江而治”,造成“南北朝”局面。他们一方面佯装与我党谈判和平;另一方面竭力引诱李济深去南京所谓“主持大业”,或者由他“造成第三种力量,以制造反共舆论”^⑰。中外反动分子还散布谣言说,李济深将“出任临时联合政府主席”,阴谋挑拨他与我党关系。李济深面临着考验,然而他坚持了正确的立场。他在香港答记者问时明确指出:关于出任联合政府主席的说法“均属不确”。“我认为南北朝的局面是不可能的。蒋政权的崩溃一定是全面的崩溃”^⑱。他亲笔写信并托人转告李宗仁、白崇禧。信中写道:我“相信共产党、毛主席是真正为国家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一切稍微具有一点正义感、民族感的人,都应赞成和拥护他们。也许有人以为过去曾经反对过共产党,现在怎么能够合得来?过去是过去了,历史是向前发展的,我们也要向前看,莫要向后看。我自己不是也反对过共产党吗?但此一时彼一时也。过去不认识,今天认识了,只要现在我们所作所为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富强的新中国,就会化敌为友”。力劝他们“当机立断”、“向人民靠拢”^⑲。李济深的这番话,严于解剖自己,言出肺腑,可谓语重心长,极尽仁义。

(下转第73页)

战斗作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虽然还处在幼年时期，但在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方面，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党正确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在此基础上同国民党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从而大大加速了革命的步伐，使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也是在这个正确纲领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基本思想。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正是在这个光辉思想的指引下，在北方地区实现了对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调动千百万革命群众参加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写下了伟

大的篇章。尽管北方的革命运动与全国的革命运动一样在后来出现了曲折，但这次革命在中国北方辽阔的土地上播下的革命火种，为后来革命事业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注释：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集，第400页。
-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集，第30页。
- ③ 《政治生活》第56期。
- ④ 《李大钊文集》（下），第824、833、834页。
- ⑤ 《李大钊文集》（下），第875、876、877页。
- ⑥ 《京报》，1925年11月29日。
- ⑦ 《政治周报》第2期，第1页。
- ⑧ 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12月4日。
- ⑨ 《申报》，1925年12月17日。

（上接第126页）

12月16日，李济深冲破了各种势力的重重包围，毅然秘密离港奔赴解放区，参加我党领导的创建新中国的伟大事业。海船经过孙中山早年就读过的玛丽医院，航行五天始出台湾海峡，在灯塔指引下日夜兼程驶向大连。海上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恶浪突起。李济深与同行的民主人士心潮翻腾，不时交谈着从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走过的艰难曲折的航程。他在沈雁冰的手册上不无感慨地写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①翌年初抵达解放区，他在一个声明中强调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在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才有不再中途夭折的保证”^②。这个结论正是他奋斗一生找到的真理，是他继承和发扬孙中山不断前进的革命精神的结果。

新中国建立后，李济深担任了人民共和国的重要领导职务，一直致力于祖国统一事业。在他与世长逝前的四天，写下了他生前未竟的遗愿：“十年国庆万年红，衡麓光辉永照中。我与全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③

注释：

- ① 《人民日报》1985年11月7日。
- ②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189次会议纪录。见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 ③ 《李济深诗文选》第4页。
- ④ 《李济深诗文选》第148页。
- ⑤ 林伯渠：《李济深先生，永远安息吧！》（1959年10月12日）
- ⑥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70页。
- ⑦ 《李济深诗文选》第43页。
- ⑧ 谢和庚：《忆李济深》见《纵横》1986年第1期。
- ⑨ 《李济深诗文选》第158页。
- ⑩ 《李济深诗文选》第16页。
- ⑪ 《关于李济深等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报告》（1949年3月31日），原件存上海市档案

案馆。

- ⑫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86页。
- ⑬ 林伯渠：《李济深先生，永远安息吧！》（1959年10月12日）
- ⑭ 冯玉祥：《我的生活》第610页。
- ⑮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01页。
- ⑯ 香港《华商报》1948年11月5日。
- ⑰ 据《李宗仁回忆录》。
- ⑱ 《李济深对美英记者谈新政协与新政府》，香港《华商报》1948年11月3日。
- ⑲ 黄启汉：《1949年‘和谈’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67辑。
- ⑳ 《李济深诗文选》第76页。
- ㉑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对于时局声明》（1949年1月17日在沈阳）
- ㉒ 《李济深诗文选》第36页。